

西南边疆“跨境婚姻”现状及社会治理的相关思考

桂宇

昆明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摘 要：“跨境婚姻”既是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表征，也是边境安定和谐、睦邻友好的国际形势反映。尤其是近20年来，我国全面实施支农、惠农、惠边政策，兴边富民行动取得较大成效，新农村建设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越、中缅、中老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数量上升态势明显。一方面，“进口新娘”缓解了我国边疆部分边远村寨中性别比失调的状况，使传统的通婚圈、姻亲网络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婚姻迁移带来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因素对我国边境地区基层管理也带来新的挑战。研究中国西南边疆跨境婚姻家庭问题，对维护边疆稳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西南边疆；跨国婚姻；社会治理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ross-Border Marriage" and Social Governance

Gui Yu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14

Abstract： "Cross-border marriage"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border areas,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stability and harmony, good-neighborly and friendly border areas. In particular, in the past 20 years, China has fully implemented the policies of supporting, benefiting and benefiting areas, and achieved great results in revitalizing the border areas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wit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cross-border marriages is on the rise in the China-Vietnam, China-Myanmar and China-Laos border areas. On the one hand, "imported bride" alleviates the imbalance of sex ratio in some remote villages in China and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circle and in-laws network; On the other hand, a serie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actors brought by marriage migration also bring new challenges to the grassroots management in China's border area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cross-border marriage and family issues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of China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border border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southwest frontier; transnational marriage; social governance

中国西南边疆国境线蜿蜒漫长，跨境民族众多。就云南而言，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境线长达4601公里，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有16个，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活动比较自由，^[1] 跨境通婚屡见不鲜。

一、西南边疆“跨境婚姻”的历史及成因分析

（一）中缅、中越、中老边境边民通婚古已有之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互市通婚古已有之。中缅边境的傈僳族、景颇族、佤族、德昂族等，中越边境的壮族、京族、苗族等，中老边境的傣族、哈尼族等，都是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这些族群世代以来共居于此，婚嫁相通，往来自由。由于共同的地理空间、历史渊源，加上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当地民众对此种通婚关系习以为常，长期以来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随着现代以来，伴随着国界的勘定，国家概念在国家之间边务管理的法理化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习以为常”的族群间交往有了国界的制约和区隔。“跨境婚姻”也因此凸显为一种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是随着民族国家边界的建构以及跨境民族的形成而出现的。^[2] 因此边民之间的通婚才成为夹杂国家、国民身份等诸多要素的社会问题。

（二）学界对“跨境婚姻”成因的基本共识

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对“跨境婚姻”的关注度逐渐上升，近年来田野资料详实，研究成果颇丰。有学者从社会变迁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边疆性别比失衡地区青年婚姻问题研究——以云南为例（项目编号18XJA840001）”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桂宇（1981—），女，汉族，重庆人，副教授，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婚姻家庭、边疆社会治理、民族艺术理论。

角梳理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产生的地缘、血缘、族缘、业缘等基础因素及其演变过程和现状，^[3] 有学者从结构视角剖析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形成的外在动力机制。^[4] 总体来看，学者对跨国婚姻的研究较多关注宏观的社会环境结构，提出经济发展的两国差距和同根同源的文化习俗是跨国婚姻市场上中国男性的“优势资源”。指出近年来由于中缅两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境外局势的影响，刺激了“跨境婚姻”数量的大幅增加。

针对近十年来“跨境婚姻”持续增长的原因，宏观视角的研究认为国内性别比失调引发的婚姻挤压是中国边境村寨中一些男青年选择“进口新娘”的深层次社会动因，是两国婚姻市场两性资源互补性结果。^[5] 有学者把“跨境婚姻”置于跨国家疆界的传统小社会，深层次考察婚姻双方“主体性”行为，认为地理空间上山水相连，族群语言、生活习惯、心理态势、文化传统以及宗教文化生活的共同性形成的文化维系力都是促成跨境民族长期以来存在姻亲联系的社会历史原因。还有学者强调，婚姻文化习俗的类同不仅构成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基础，还是维系婚姻家庭的纽带。^[6] 也有学者指出，边境两国的经济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不同年代的跨国婚姻现象，民族认同也不能完全说明族际通婚的增加。^[6] 总之，“跨境婚姻”并非新生事物，这种婚姻形式是多重因素合力而成的社会事实。

二、西南边疆“跨境婚姻”的社会性特征

在云南某些边境村寨里，血缘关系若上推三代，90% 以上的家庭都发生过跨国婚姻。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云南边民的“跨国婚姻”基本处于动态平衡之中。^[7]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缅甸、老挝、越南婚姻迁移而来的“进口新娘”数量激增，尤其2019年涨幅明显，其中90% 的跨境婚姻都分布在云南省与三国接壤的各州市沿边25县乡镇。

（一）跨境通婚数量上呈持续增长态势

据相关部门数据，2009年云南边境入境通婚人数为2.5万人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2009年登记涉外婚姻1158对。2010-2018年间，怒江州涉外婚姻登记约1000对。截至2014年4月，红河州金平县边民通婚904对，其中哈尼族128对，占结婚对数的13.6%。红河州与越南交界的11个乡镇均有越南妇女嫁入中国的情况。据十年前的不完全估算，云南边境地区入境通婚人员数应在3.5万到4.5万人之间。^[8] 自2013年以来，我国男女性别人口比每年递增在10%以上，故而每年将有120万男性人口在我国各地的婚姻市场上找不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配偶。^[9] 而婚姻挤压和婚姻梯度理论研究也表明，这种情况在边境经济条件欠佳的地区尤其突出，这些地区实际也是“进口媳妇”分布较多的地区。

（二）跨境通婚的家庭存在普遍共性

一方面，跨国婚姻移民呈现低龄化，早婚早育现象有增长趋势。此类婚姻形式以外籍女性入境通婚为主，占比超过85%，女性通婚年龄偏小（20岁以下占比77%），文化程度偏低（小学文化及以下占比83%），夫妻双方男大女小的年龄差距明显（男女年轻差距在8岁以上占67%）。从双方原生家庭来看，跨境婚姻涉

及的双方家庭大多位于偏远乡镇，且双方家庭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因此有学者提出这是“弱弱结合”的婚姻。

（三）跨境婚姻迁移形成一个新的群体

过去新闻报道过，越南女性嫁到中国男子后卷款逃跑的骗婚行为，也有学者将男方支付给女方的彩礼钱视为买卖婚的线索。但在实际调研中得知，拐卖、骗婚的行为并不多见，当下跨境通婚是双方自愿缔结姻亲关系。边境地区是一个民间往来频繁、商贸流通自由的生活场域，在这个熟人关系网络中，婚姻信息得以传播，甚至之前嫁入中国的一些越南、缅甸妇女也会从中牵线搭桥，介绍自己家乡的亲朋和熟人与中国男子结婚。“进口媳妇”的婚婚示范效应就是其对自身主体性选择的良性评价，也因此促成了更多的跨境婚姻。此外，跨境通婚的范围以边境沿线乡镇和村寨为主，但已出现从边境县市向边境州市的非边境县市及省内其他城市延伸的情况，跨境婚姻迁移范围逐步扩大。

三、“跨境婚姻”对边疆社会治理的挑战

当前主要问题是外籍嫁入的“进口媳妇”入籍率、落户率低，造成很多事实婚姻。陇川县1986年曾在全县排查事实婚姻，督促办理婚姻登记。根据对79位村民的问卷调查，结过婚的65人中，领过结婚证的仅为15人。^[10] 在传统社会，按照民族婚俗仪式“结婚摆酒”就意味着新家庭得到了族群认可与接纳。在村寨中，也有少数女性未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有先摆酒、过后补证的实际情况。现实中多种复杂的因素也成为多年来跨国婚姻实际数量难以准确统计的原因，故而很多学者从不同部门获悉的数据存在一定偏差。有学者了解到：截至2015年在广西及全国的越南新娘总量就近7万人，其中很多都是“户无可登、地无可耕、医无所保、老无可依”的困难人群；云南省8个边境州市的跨境边民通婚合计11732户，生育子女总计14427人。^[11] 但实际婚姻登记的人数与调研所获数据出入较大。究其原因，一是越方边民提供不了身份信息。有部分越南女性说不清自己在越南的具体居住地，有的越方基层村委会对于该国女性与中国边民通婚有抵触情绪，不愿意为越南妇女出具相关证明。二是越方出具婚姻登记相关证明手续费高，办理前还需要到大使馆认证，办理时间、办理支出成本高，导致当事人不愿办、没钱办。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跨境婚姻”的确存在一些不稳定性，或者说，上述两个现实因素客观上加剧了这类婚姻关系的不稳定。以云南河口县为例，跨境通婚大多分布于边境村寨，家庭经济条件欠佳、双方文化程度较低是普遍现象，家庭发展能力弱，越南女方跑婚、失联的情况时有发生。

2011年之后，我国全面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边疆群众带来了较大的社会福利。办理社保需提交户口证明和身份证，没有中国户籍的“跨国媳妇”不能办理。入境结婚的外籍妇女既不能享受中国对边民的政策福利，每一个有跨国媳妇的家庭始终处于分崩离析的潜在危险中。^[12] 此外，由于“理不顺”的身份问题，使此类家庭和所生子女显得“与众不同”，容易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弱势群体，影响其正常融入社会。

四、关于制度规范与现实治理的调适思考

制度不仅从宏观上规定着各个族群经济生活的延续状态、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还决定着社会变迁的路径。婚姻是新家庭诞生的标志，“结二姓之好”，使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结合成社会的一个个细胞，既涉及个体的繁衍，又涉及群体秩序。因此社会成员必须依赖婚姻制度才能满足自身繁衍生存的需求。

从历史观之，民族情感、经济因素是跨国婚姻之所以持续存在的两个核心要素。边民通婚行为并不会因为婚姻登记办理手续的难易程度而受到本质影响。随着人口流动与经济关联度的越来越凸显，跨境婚姻将作为长期存在的一种通婚现象，通婚政策影响的是此类家庭的生产生活秩序、家庭稳定和后续发展。在法与情、事实与制度的权衡中，应考虑弥合正式制度的社会控制与非正式制度的行为选择之间的张力，实现对跨国婚姻合情合理、合法有序管理，才有利于维护跨境边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13]

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与邻为善，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

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国家。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二十大强调中国以和平发展为外交底色，以“亲仁善邻”为外交文化，以“和合共生”“世界大同”为价值追求。边民通婚，在国家意识、族群意识之外，还有边疆老百姓现实的生活需要、情感需求，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与稳边固边、乡村振兴、国家认同等有直接关联。

更何况，跨境通婚家庭所生育的子女也是中国公民，其成长过程中，是否会因为母亲的“身份悬置”、家庭的“异质性”带来的困难使孩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对中国国家认同感的缺失、政治认同的冷漠、自我身份归属上的认知焦虑、语言优势和技能优势被忽略等问题，这也是当下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14]

跨国婚姻涉及不同邻国，各国通婚政策也有所不同，应本着相互尊重、以人为本的原则作为政策调整和制度完善的出发点，在“疏”与“堵”的政策上把握好导向，理顺并简化婚姻登记流程，减轻边民通婚登记的费用成本，既彰显法律的规范性和权威性，让跨境通婚的家庭和家庭成员既在政策保障之内，又在法律监管之中，真正体现大国的社会治理水平与效能。

参考文献

- [1] 方天建. 云南跨界民族涉外婚姻外籍子女受教育问题之探讨[J]. 民族教育研究, 2016(2): 26-31.
- [2] 柳春媛. 在场与悬置: 跨境婚姻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J]. 民族学刊, 2020(5): 26-35.
- [3] 郑宇、杨巧红. 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J]. 学术探索, 2009(5).
- [4] 罗柳宁、吴俊杰.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现状及研究设想[J]. 东南亚纵横, 2009(1).
- [5] 陈讯: 资源互补、婚俗类同与结构性力量保护下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以广西崇左市G村为例[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7(4).
- [6] 王晓艳. 从民族内婚到跨国婚姻: 中缅边境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J]. 思想战线. 2014(6): 54-57.
- [7] 汪丹. 族群认同背景下傣族跨境婚姻研究[D]. 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8] 张金鹏、保跃平. 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与社会稳定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3(1).
- [9] 刘中一. 东南亚新娘现状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13(1).
- [10] 王晓艳. 从民族内婚到跨国婚姻: 中缅边境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J]. 思想战线. 2014(6): 54-57.
- [11] 杨国才、施玉娇. 边境跨国婚姻的研究与展望[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 118-125.
- [12] 陈炼: 滇越边境哈尼族跨国婚姻的“制度路径”探索分析[J]. 红河学院学报, 2019(3).
- [13] 保跃平. 选择与困境: 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 5-12.
- [14] 周建新.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及子女的身份困境——以广西新县壮村个案为例[J]. 思想战线, 2008(4): 1-8.